

十五年代

向培良著

支那書店發行

十五年代

向培良著

支那書店發行

1930, 3. 出 版

1—1000 册



實價大洋六角五分

一個卑微的故事

看到了這一年的事實，我著者也是深深憎惡共產黨的，雖然我完全不懂得政治。說到共產黨破壞社會的罪惡，真是無從計算；但是我著者，因為共產黨的罪惡，因為憎惡他們，却更其憐惜人類了，因為人類的損失。我憎惡一個共產黨，但是我愛一個人。說是罷，縱然窮凶極惡的人呢，却也是和我們一樣，是我們的兄弟呢。爲了兄弟們的痛苦，兄弟們的沉淪，兄弟們的喪亡與滅落，雖然是厭惡罷，誰能夠沒有悽愴惻怛

的心情呢？在最後的一刻，在死亡吞滅一切的時候，又誰能夠執着於從前的經歷呢？想想罷，只要一想到那些死者，在戰爭時，在法場上，在監獄中，在無盡的逃亡之程途，以及那些於被捕時從繩子，從水，從絕去飲食而自殺的，想想那都是我們的兄弟，都是應該可以成爲人類的工兵，成爲生產者的，因爲是共產黨，——而他們之所以成爲共產黨也有許多原因，爲馬克斯主義的，爲生活被壓迫的，或者，僅只是機緣之偶然的，他們都一樣，爲不可避免的命運之鐵鉗所夾，由此變爲人類的破壞者而被殺。一想到這，總覺得是人類底損失罷。只要一聽到那沉重而啞的槍聲，知道有一個靈魂已經離開了軀體，那心情是多麼的沉重喲！據說，當每一個靈魂離掉了軀體的時候，沉重的罪孽便和死去的軀體同時消逝。那飛出來的靈魂，縱然是帶一點灰色罷，也還是鴿子樣的東西，這靈魂將一直飛到上帝那

裏，上帝是，也正和接待善人和正直者一樣接待他們。上帝將對他們說：“你愚妄人，你有罪者，也到我這裏來罷。雖然你的罪孽是不可恕的，但是你們的眼淚，你們的苦痛，你們所受的刑罰，已經可以洗淨你們的罪了。”

——人類都是兄弟。

我著者這一次是陷於不可拔的地位了。恐怖和痛苦在追逐着我，雖然所住的地方離刑場已經很遠了，但是每天，唉，簡直每天都是，有沉重而啞的槍聲傳到這裏來，是槍斃共產黨的聲音。隔開了一渡河，隔開了幾所高大的建築物，隔開了許多樹木和房屋，但槍聲却固執地傳過來，似乎牠沒有別的地方可處呢，唉！

有一次，無可如何地在道上遇着就刑的人們了。我躲在旁邊，戰慄着不敢看他們，又無端偷偷地投以一瞥，唉唉，那臉子，人類的臉子呵！那既不是想像中的慷慨激昂，叫口號和怒罵的

英雄，也不是想像中的哭泣苦痛，只是呵，在那臉子上已經消失了人類一切所有，消失了生命，消失了血和肉，凝在那上面的只是無際的空虛和死亡。我想起了綿羊就死的情形，那是馴順而且無聲，而且苦痛——願上帝饒恕了他們的罪孽！

衝鋒號和喊殺的聲音，在行刑時所表演的，是如此頻繁，以至於小孩子都學着在唱。一聽到了這些人類的幼小者，還不會知道衝鋒號和喊殺的意義的孩子這樣唱着的時候，我的心是比看見那實有的境地，比看見就死者恐怖的面容，比看見罪惡的犧牲在槍聲中仆地，我的心是還要悽涼些的。罪惡已經在槍聲之下消滅了，但是這印像，這傷慘的心情，這人類靈魂上的污跡，這殺機，却永遠刊刻在孩子們的心上（我願意孩子永遠不知道這樣的事情），遺留到下一個時代去了。咳，我們的詩人曾經夢想到將來會有一個

時期，沒有皇帝，沒有兵，沒有刑罰和殺戮，人類兄弟和睦同居。我們古代的學者也有一個至治之世的理想，那時候是殺止刑錯，天下大同。但他們却把那個理想歸於過去；時間把那個世界愈引愈遠，把現在愈變愈壞。但是我著者却這樣想，假如我們將來不能夠把戰地化爲和睦之宮，把刑場化爲相親之殿，把殺場化爲擁抱，刑罰化爲贈與，那麼，人類爲什麼要存在呢？豈不是沒有人類到還是較好的事麼？假如那樣的時代是絕不能夠達到的，我著者，縱然是卑微的聲音罷，將咒咀人類，咒咀神。

不是憎，乃是愛，才能夠消滅人類的罪戾，造出一個較好的時代來。

我著者現在要告訴你們一個卑微的故事。這不是一篇小說，不是什麼虛構的東西，因此這個故事裏面沒有偉蹟，沒有俠情，沒有戀愛，實在是毫不關重要的，只是這大時代裏的一點微

沫，如我著者一樣卑微。我呢。只是就我所知道的寫下去，沒有添加什麼，也想，假如能夠做得到的話，不減去什麼。你們，高貴的讀者，要是你們吃飯以後，或者在工作終了休息時間，有一點舒閑的光陰，覺得虛耗了也並不可惜，那麼，我著者請求你們含一枝煙，一杯新煮的熱茶放在旁邊，一張適宜的躺椅睡在你們舒弛的軀體底下，來垂聽我這個卑微的故事，要是你們無論聽到什麼地方，覺得大不耐煩，只要一皺眉頭，或者一舉手，我著者便會輕輕走開去。

在這故事裏面，只有女主人的真姓名我沒有說出來，說出來或許會與她有什麼不方便。我著者給她擬一個名字叫珍子。她是民國四年生的，完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孩子，吸取着這個時代紛擾悽苦的乳汁而生的。

珍子今年十三歲，因為家裏窮，她又發育較早，所以成為營養不良的孩子，她長得比較高，

單瘦，有着營養不良的孩子例有的蒼白的臉和大而陷落的眼睛，有着營養不良的孩子例有的怯懦，沉默和陰鬱。而且，有着例有的早熟的智慧呢。牠有父親，母親，兩個姐姐，一個弟弟，一個妹妹。父親三十九歲。母親三十六。姐姐是十八和十五，通沒有出嫁；弟弟和妹妹都很小。他們住在火車站旁邊，父親是做腳夫的。她和姐姐通是織機工，已經失業了。

事情是這樣開始的：

十六年的秋期，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。因為時局不穩定。又是打仗，又是共產黨暴動，又是鹽荒，所以雖有一個很好的秋收，民間的情形總是天不如天！市面的經濟一枯窘，鐵道的營業便衰敗了。以前，一車一車的客人和貨物裝着上下的，現在却變成一車一車的兵，怖人的東西了。望着車站一天天蕭條零落了，正如同看一個壯年人得了不治之病，天天消瘦下去。以前她是

歡喜，吵鬧，顯着無窮的光采，而一切都在兵的灰色的脚下消失了。看見了這個，住在車站旁邊靠車站爲生的人，是多麼傷心呢。以前每一次車輛來到，生命立刻擁擠到那裏，金錢隨處都是的，只要你有去取的元氣，於是給他們帶來歡欣和幸福。這情形完全變了。每一趟車來只給他們帶來沮喪。從兵那裏，他們能夠取得什麼呢？而且是危險的呀。但是珍子的父親是一個好的父親，盡力量，負責任，雖然在不利的環境之下，他仍然照樣做，絕不鬆懈。他仍然一清早就拿着他的曲扁挑和繩索出去，傍晚才回來；他馬蟻般尋找工作，走遍了他所能走的地方。然而却有好久他不能夠從腰帶裏抓出滿把滿把的銅元，沒有帶着微醉的紅色在臉上（以前他高興的時候，照例要喝四個銅元的白酒回家；他絕不像別人縱飲）。家裏的景況是一天不如一天。

又是這樣愁慘的時會。母親遏抑地輕輕說

着，怕人家聽見了而又不能不說似地：“怎樣辦呢，早上又沒有米了！”父親默着，沒有答應。母親是，以爲他惱了，抱歉似地解釋着說：“人口多，要吃的，真奈何？”父親仍然默着，伸出他的大拳頭，威嚇地憤怒地揮着。但是他的拳頭雖然大雖然有力，金錢却並不服從。反而譏諷地走開了。於是她拿起她的曲扁挑，不吃早飯就出去了，母親以憂愁的抱歉似的眼光隨着他。

這樣的情形並不只一次，而且逐漸迫切。

而大姐姐也沉默着。幾天幾天不聲不氣地，她儘是坐着，懶得動身，也懶得說話。一天晚上，母親又感嘆地對父親說，“米完了呢！”

“怎麼又完了呢？”雖然是質問的話罷，却說得非常和軟，因爲他早知道米是應該完了的。

“人口多，要吃的，怎麼辦？”母親遏抑着說。

“我一天天沒有生意，並不是不願意做——”話到這裏就斷絕了，似乎他沒有氣力再說下去。

接着是無既的沉默，但是大姐姐從沉默的黑角落裏起來。

“這樣下去終久沒有辦法的。吃的多，做的少，況且又沒有生意，爹爹一個人自然做不來。我已經打定了主意到省裏去，看能不能夠找到工作。前幾天我從先廠裏同學的來告訴我，說省裏一家工廠裏招工，不曉得真假如何。她約我同去，我想去碰一碰。再不然就帮人家去也好。到省裏可以先到那同學的家裏住幾天。”

“要是找不到工做又怎麼辦呢？”

“那也不要緊，我可以再回來的。我去總要找到一點事，只要有飯吃就是；到底屋裏可以少一個人吃。”

這夜的話只說了這一點點。父親沒有作聲空虛地揮着他大的拳頭。

兩天以後大姐姐走了。她去的時候。珍子覺得她以異樣的眼光望着她，以異樣的神情握着

她的手。她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但是吃驚了，被那緊張和淒涼。她似乎覺得大姐姐是到什麼很遠很遠的地方去，去了不會再回來。所以才用異樣的神情望着她，珍子是個敏感的姑娘。每天晚上，她母親把燈熄了就寢的時候，她總有一種異樣的感情，似乎是她忽然失掉了什麼，忽然消沉在空虛的恐怖裏。如今在大姐姐走去的時候，她的影子一下子從面前消失的時候，珍子又感到光明消逝了似的感情，而且更其沉重地壓着她。“為什麼呢？”她想，但是她不能明白。大姐姐走了以後，尤其是珍子，家裏感到未有的寂寞。父親默默地走出去又走回來，母親嘆着氣。本來讓年輕的女兒走到陌生的地方去，一無所有地去謀她自己的生活，又誰能夠放心呢。珍子是，暗夜中醒來，只緊緊地抱着她二姐姐呢。

過了不久，大姐姐付回五元錢，說是已經找到了工作，先支點薪資寄家裏的。家裏的喜歡，

簡直非我著者所能形容。高貴的讀者們，五元錢在你們的錢袋裏是很微末的。喝一杯咖啡，坐半點鐘兜風的汽車，或者吸一兩支適口的雪茄，五元錢便沒有了。不過窮人似乎也有窮人的計算。像他們那樣一家，五元錢至少可以用一個月。五元錢一個月似乎有一點神祕，但並非著者虛擬，不是怕高貴的讀者們厭煩的時候，我很可以把這筆帳開出來。這奇蹟，窮人是知道的。就是上海這樣的地方，二十來個銅元一天地生活下去，我著者也曾過過；怎麼樣使肚子飽而不讓太多的錢溜出去的這祕密是握在我們手裏的。

以後，大姐姐又陸續付一點錢回來。她是把這一家的生活担负在自己的肩上，在父親失掉了工作的時候。

現在，假如不是時局太不對（這裏也沿用着時局不對底字樣。至於怎麼樣叫作時局不對，我著者也和他們一樣完全不知道），他們一家是很

可以快樂一點的了。打仗剛才完，共產黨又到處起事：打土豪劣紳，毀菩薩，燒房子，殺人，簡直無所不爲，聽說還要殺盡反動派，殺盡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呢！（共產黨是否要殺盡二十五歲以上的人，我是不知道，因爲都會裏的紳士們這般宣傳，我便這般的寫。）聽說在省裏鬧得更凶，燒鐵路，打電燈公司，放炸彈，白天街上沒有人走路。

共產黨成爲這個時候最大的恐怖。據說是洪水猛獸似的。但在老百姓們看來，是超乎洪水猛獸之上的。就是淹滅他們一切的洪水罷，是吞噬他們的猛獸罷，雖然凶，但他們總捉摸得到的，知道那情形和逃避的方法。共產黨是什麼呢？共產黨要怎麼樣呢？他們完全不知道。恐怖和災禍懸在他們面前，而他們却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，應如何對付——於是，除掉戰慄地等待命運之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法子了。他們痛恨共產黨，雖然也許他們從不曾看過一個共產黨。這

於他們是一個神祕。而最大的恐怖是那無知之恐怖。

大姐姐凶耗傳來的那一天，是一個陰暗的細雨的冬天，冷，風不停地吹，人們都凍雀似地縮着。開雜貨店的王七鬍子到他們家裏來了。他是這地方領袖人物，知道一切的消息，管着一切的事情的。他走來。站在門限旁邊，他臉上失掉了常有的舒閒風度，舞着長煙管，憤慨地大聲說着；他的話好像是對他們說，又好像只是宣洩他自己。

“真了得，你們某妹子是共產黨！真豈有此理！”

母親臉通駭青了，不敢作聲，並且她也實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他接着說，

‘好，發傳單，造反，作亂！共產黨都當得的？殺爹娘，滅祖先，毀神明，報應就在眼前呢！一個共產黨的頭子把他爺老子親手殺了，跳上演說